



蒋天枢先生的父女情

○马国馨（1965届建筑）



蒋天枢先生

又快到莺飞草长的三月了，想起我们建五班同窗蒋钟埭同学和她的父亲蒋天枢先生，都是在三月先后离开的，那已经是40多年前的事情了。

蒋天枢先生（1903—1988），字秉南，早年就读清华国学研究院，后来是复旦大学教授，我国著名的文史学家，复旦中文系“十老”之一。我听到他的名字相当晚。那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学术界掀起了研究学术大家陈寅恪先生的热潮，特别是1996年，三联出版社出版了陆键东先生著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引起了学界内外人们的注意，将研究陈寅恪先生又引入了一个高潮。在这本书里，我第一次知道了蒋天枢先生的名字。书中说到他是清华国学院1927年入学的第三期的学生，当时清华国学院任教的四位大师中王国维先生已去世，赵元任先生去了南京，梁启超先生是蒋的导师，但当时多病，所以那时他多向陈寅恪先生请教，并于1930年完成了论文，1943年后在复旦大学任教。

在新中国成立后，蒋先生与陈先生还

有过三次在一起的相处。第一次是1949年陈先生从南京到上海停留，蒋先生曾多次去拜见陈先生，两个人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陈先生的心目中，蒋先生的厚道、忠恕开始凸显。第二次是在1953年秋，蒋先生专程南下到广州去探望陈先生。之后陈先生写了两首七绝送给蒋先生，里面写到“文章存佚关兴废，怀古伤今涕泗涟”，这是陈先生向蒋先生倾诉自己的心迹和情感，表明了他们两人之间已有深交。而最重要的是第三次。1964年5月，蒋先生乘火车抵达广州探望病中的陈先生，这次陈先生向蒋先生做了一生事业的“生命之托”，他将自己晚年编订的著作整理出版之事全权授予蒋先生。虽然在1949年以后的15年间，陈先生只与蒋先生相处两次，但陈先生却毫不犹豫地让这位长于先秦古典文学研究的弟子，来编辑出版自己留给这个世界的著述，托付了他一生最为看重的事业。陆键东在书中也提到：“若以与陈先生接触的渊源而言，比蒋先生更深的陈门弟子大有人在；若以知识才华而言，比蒋更深刻地理解陈先生学术精髓的陈门弟子也不在少数；但陈先生只认定蒋先生，可见陈先生环顾前后左右，已找不出第二个可以‘安心托命之人’。”事实证明了蒋先生果然不负恩师所托，15年后按照陈先生生前所编定的著作原貌，花费主要精力，辛勤校订编辑，并顶住各方压力整理了《陈寅恪文集》，于1980—1982年陆续出版。所以，陆键东



1953年，蒋天枢先生（左1）在广州和陈寅恪先生（左2）及家人合影

在书中写到：“蒋天枢对于陈先生晚年的意义，不仅是他给了陈寅恪一份浓浓的师生之情，而且他还使陈寅恪在坚守‘独立之精神’的士人气节上无限欣慰感到‘吾道不孤’。”这是对蒋先生极高的评价，由此也可以看出蒋先生的人生信念和处事原则。

本世纪初有一次我回到清华，遇到时任清华校友总会总干事的承宪康学长，承学长对老校友十分关心，他特地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拿出一本书，说：“你知道蒋天枢这个人吗？”我说：“从介绍陈寅恪先生的书中知道了。”他告诉我说：

“你知道吗？你们班蒋钟埏的父亲就是蒋天枢。”我听后大吃一惊，原来我们班已去世的蒋钟埏同学的父亲竟是大名鼎鼎的蒋天枢先生，过去一点都不知道。此后，在很多学术和回忆文章里也看到有关蒋先生的事情，于是就买了一本《蒋天枢传》，是朱浩熙先生所著，2002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作者朱浩熙是出生于1944年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生，毕业后长期在徐州市从事行政工作，写作为业余爱好。他和蒋先

生有同乡和亲戚关系，在校时就经常向他请教。此后又和蒋先生多有接触，很钦佩先生的学识和人品，觉得有责任为蒋先生作传。在书中多处提及蒋先生的大女儿蒋钟埏，并有一章专门写了她在清华读书及婚后产子、生病，以至病故对老父的打击等。2011年清华百年校庆时，我们建五班出版了一册《画忆百年清华》，其中收集了班上41位同学的人物和风景画作，我也绘制了一批清华人物肖像，其中有蒋天枢先生，并在画上注明“晚年全力整理编辑恩师陈寅恪的著作，其女蒋钟埏系建五班同学，不幸英年早逝”，以表达对蒋先生的敬仰。

2023年，由团结出版社再版了《蒋天枢传》的增订本，篇幅增加了六章，文字也由22万字扩大到了38万字，内容更加充实，对他们父女、爷孙间的故事也增加了不少，他们之间的经历和深情让我看了十分感动。从传记中可以看到，蒋先生和刘青莲女士婚后在1937和1938年有了两个儿子蒋钟琦和蒋钟霖，但是在1940年的战乱中，在四川因为疾病老二和老大在一周内先后去世，让他们痛不欲生。

到了1942年的5月7日，在四川三台县城，大女儿出生，蒋先生自述：“壬午年旧历三月二十三日庚申长女生，初呼为大娃，后改名为钟埏。”这个“埏”字是黄土地的意思，蒋先生在外敌入侵时，为女儿起这么个钟情土地的名字也可以看出他的情怀。1945年1月，小女儿钟垣诞生于北碚，由于前面两个儿子的早夭，所以对两个女儿的关心和疼爱更是无以复加的了。

蒋钟埏和我们在1959年同时考入清华大学建筑系，当时称为建五班，全班90

□ 人物剪影

人，分为三个小班，蒋是在建五三班，学号是591114。虽然分为三个小班，但是许多课程都是大班一起上的，设计小组也是大班混编，所以彼此还是比较熟悉的。那年招收的上海建筑系同学有20人，在离开上海前往陌生的北京时，有个同学后来曾回忆：“1959年9月初的一个傍晚，一群清华大学的新生聚集在上海北站的广场上，校方委派的建筑系学兄把上海同学编在一起，怀着对首都天安门、对清华园的向往，新生们登上列车，伴随汽笛声声，挥手向送行的亲人告别……当年来送我的是还在读小学的表弟，他指着一个女同学悄悄地说她好像‘太阳公公’（童话中拟人太阳），我注意了一下这位同学，红红圆圆的脸庞，健康饱满，充满朝气，不时同相识不相识的人打招呼，还未离开上海已经满口‘国语’了。这在上海同学中是绝无仅有的，她的心已经飞到了北京。来校后我才知道，她就是蒋钟埭。”

这里生动地描述了蒋钟埭当时激动、活泼的表现。在蒋先生去清华求学的32年之后，他的大女儿也踏入了清华园，两代清华人的情结可想而知。一开始我们都住在校东区，但很快女同学住到西区新斋，男同学住到二号楼，同学间很快就熟悉起来，许多人就都有了昵称或绰号。像我被称为“马老”可能是我当时不爱讲话的缘故，而蒋钟埭的绰号就是“蒋猫”了，也不知道是谁起的，但很快就叫开了。

蒋先生对于两个孩子的教育也是爱之深、责之严、望之切，时时加以提醒和指点。尤其大女儿蒋钟埭上了清华大学

以后，父女之间经常书信联系，在传记一书中有多处提及他们的书信内容。我们刚刚入学时，梁思成先生和新生见面，马约翰先生给大家作报告，课程内容也很多，有建筑概论、建筑设计初步、画法几何、测绘、美术、外语、高等数学等十几门课。蒋先生在开学后不久的9月15日给女儿去信说：“初到京，一切生活紧张兴奋，皆可鼓舞意志。此后课业渐忙，当可渐沉下心来学习。你既得一好的学习环境，当能锻炼身心，勤勉谦虚，求能有卓越成就，才可为国家社会主义事业贡献精力。”另外也鼓励女儿要牢固树立专业思想，扩大专业知识面。

入校时活动还是十分丰富，例如新生运动会、文艺社团和体育代表队招收新成员，参加十月一日国庆节的天安门游行和晚上广场的狂欢，11月份我们又到八达岭参加植树劳动，年底还有教育方针的学习，等等。蒋钟埭学习也十分努力，同学们都记得她的古建测绘作业曾在中国美术馆展出过。

此时，蒋先生正在忙于出版自己的研究成果《楚辞新注》和《楚辞新注》的导论，但他还在1961年4月给女儿写信：



建五同学在农村劳动。前排左2为蒋钟埭

“人类学习文化，主要有一个正确的理想，一个不仅仅为自己生存而活着的理想。己身之外有祖国，祖国之外有人类，能对国家对人类做出一些贡献，才是精神上最大的快乐……一个人光为吃饭而活，是多么庸俗啊。”同时他还提出：“盼儿能计划好自己时间，第一，把身体锻炼得好上加好。第二，尽力去做。做到哪里是哪里，不必时时考虑时间够不够问题。”“学习要生动活泼，业务书要看，有水平的科学书、历史文学书也要看。”

紧接着我们还有军训，工地实习，以及一些设计课调研，时间还是十分紧张。这时蒋先生又特地叮嘱女儿要“注意逐步提高思考能力，学习才能有效果。学问，是由点到面，再由面而加深点，逐步循环往复的过程。只有认识达到系统化，认识经过实践而逐步洽熟、深入、透彻，知识才能是自己的。这样的知识才能够‘过得硬’”。蒋先生的这些人生理念、治学方法现在看来对我们也是大有教益的。

蒋钟埏按照父亲的要求和自己的兴趣参加了清华大学学生文艺社团的军乐队。当时在音乐室设有专职教师，乐队中大部分成员都是从入门开始，在老师一对一的教育下而成长起来。当时建五班有半数以上的同学参加了体育代表队和文艺社团，其中有十多人参加了军乐队，大家组织一个小乐队是富有余的。我曾在乐队中吹萨克斯管，蒋钟埏吹长笛。她的业余生活内容还是十分丰富，由此也提高了美学修养。

到了五六年级以后，我们学习的内容就更加复杂了，除了各种新的课程和设计项目以外，还有专业实习、工长实习。按照学校的安排，很多设

计课都是“真刀真枪”的实际项目。到了快毕业前，设计项目都比较复杂，需要做大量的调研工作。这时蒋先生特地给女儿来信说：“你现在年级稍高，功课越来越重，但须自己心中有主，不宜整天处在忙乱被动中。心中应作好安排：哪样应当多花些气力，哪样决定，心中有数，自然就不把它看作负担，循序渐进，日久兴趣自会增高。”

1964年5月29日，蒋先生到广州去看望陈寅恪先生，也就是这次受到陈先生的委托重任：“多年教书治学，自问未尝偷懒，写下百万余言，很想编一文集行世，让后人品评月旦。寅恪已届风烛残年，此事便拜托秉南兄了。”并赋诗三首赠他，提到“拟就罪言盈百万，藏山付托不须辞。”蒋先生还在5月30日给女儿写信，鼓励她在实习的时候要坚定志向、持之以恒。他说：“人要希望一生能有些成就，没有什么秘诀，主要有志，能持之以恒。”

通过毕业设计，我们每位同学都得到很大的锻炼，蒋钟埏也不例外。当时我们的班主任林贤光先生，曾经在我们班的“红建五”小报上写过一篇短文，题目叫《小中见大——从一个设计小组看同学的



1965年毕业前在天安门广场。左3为蒋钟埏

成长》。文章中表扬了蒋钟埏等四个同学一起进行的左家庄幼儿园的设计：“蒋钟埏同学在工作中体会到今天的干部必定是挑起两副担子的。她在担任副组长的工作中，主动抓思想工作，学主席著作，收到很好的效果，进步很大……同学活学活用业务知识，都能独立地完成质量还不错的施工图任务，如蒋钟埏、爰居都改行搞了电照设计，而且任务完成得很好。”同时在这张小报上也还有一条简短的消息说：“女同学在组长‘蒋猫’的领导下，每天下午五点在新斋前打球、跳绳、做操。”在毕业前的最后一个新年的同学联欢时，蒋还和其他女同学一起跳了藏族舞蹈《洗衣歌》。这说明，在六年的大学生活后，原来就活泼好学的蒋钟埏无论在思想上、工作上、学习上、社会工作上都有了很大的进步。

9月份，大部分同学们分配报到了，天南地北，各奔东西。其中蒋钟埏和另一位同学被分配到北京的第四机械工业部电子设计院土建室。

很快就到了1966年。蒋先生在这时候受到红卫兵的很大冲击。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先生交出了一批“四旧”书籍以及数十张心爱的唱片，但是对陈寅恪先生托付的著作文稿则护若生命，妥为收藏。在1967年，先生又遭遇弟弟蒋天格自杀，自己因感染引起血小板极低住院抢救，在医院救治了很长时间，1968年几乎全年都在医院度过。

1969年，先生在家养病康复，但年底时听到陈寅恪先生凄惨去世的迟到消息，不久又知道师母也去世，使蒋先生痛苦万分、寝食难安，并时时想起恩师托付他的重任。蒋钟埏在四机部十院工作也十分繁

忙，经常要下工地现场，出差到陕西、湖南、湖北等地。1970年她和十院的同事吕开盛结婚。婚后于1971年9月产下一个男孩。吕开盛为孩子取名叫海川，因为当时他在干校，孩子是在上海出生的，“海”表示上海，“川”表示四川，收入了父母的籍贯。蒋先生也非常同意，并表示海川也可以认作自己的孙子叫蒋海川。1973年5月，蒋钟埏又产下一个女儿，蒋先生为之取名海春，“海”还是指上海，“春”有盼望春来的意思。由于孙子孙女的出现，蒋先生在第三代身上也花费了很大的心血。为支持大女儿的工作，孙子出生后长期跟着他们生活，在上海上了幼儿园，到上小学时因为户口问题，只好回北京了。蒋钟埏在生第二个孩子时，虽是剖腹产，但因胎盘剥离不净，造成大出血，虽经输血抢救保住了性命，但此后身体大不如前，她的病情就成了二老的心事。

当年年底，二老来京看望女儿，同时也遇到几位老朋友、老同事。他们看到二老的身体，知道小女儿1970年大学毕业后分到长沙工作，大女儿身体又不好，为此建议他们二老可否移居北京。蒋先生听之有理，可是具体操作起来谈何容易，费了很大力气也无结果。直到1978年二女婿在上海读研，小女儿在次年调回上海，二老身边才算有人照料了。

与此同时，蒋先生为陈寅恪先生整理遗作的工作量很大。从1973年开始，虽然因为身体不好及其他事情的干扰，影响了工作的进展，但到1976年还是和有关单位谈好了出版陈先生文集的事项。此后，除了编辑整理手头已有的文稿以外，还要花费很大的气力寻找陈先生的重要遗稿，为此他先后给广东省委的习仲勋同志

以及中宣部的周扬副部长写过信。最后在1978年，陈先生的文稿终于找到了一批，这样为蒋先生的工作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之后他又集中主要精力工作了好几个年头，最后终于完成了陈先生的诗文集一共七集九册，陆续交给出版社。从1980年起第一册出版，然后分批陆续出全。这些文字的集中出版一方面完成了恩师的重托，同时对学界研究陈寅恪先生的学术和思想起到很大的引领和促进作用。

然而就在同时，蒋钟埭的病情也逐渐加重，要频频去医院就诊。这期间她还按照父亲的要求，在北京代父亲办了许多事情。像蒋先生的二期学长唐兰先生1979年去世以后，父亲委托女儿夫妇去参加他的追悼会，并代送花圈。父亲还多次嘱咐代他去看望一期学长老友高亨先生，并嘱托她：“儿哪天有机会去看他时，须多去安慰他，并道我无时不在怀念在京的最老的朋友。”

1981年蒋先生因病毒性感冒住院，蒋钟埭从北京赶来探望，一起度过了两个月的时间，父女之间有很深入的感情交流，但女儿并没有谈自己真实的病情，只说是

类风湿性关节炎。父亲看她又黄又瘦，有气无力，也想把她调回上海，后因家庭意见不一作罢。

在1967年、1979年校庆和1981年7月建五三班同学聚会时，蒋钟埭都出席了，但要强的她从未向同学们提到自己的病情。

就在学术事、家事都非常繁忙的时候，蒋先生还在考虑着另一个重要的问题。他在1982年初，给陈云同志写了一封长信，结合“文革”以后学术界、教育界的现状，提出了两件事：一是有关古籍整理问题，出版机构亟需增加；另一个就是关于综合性大学学科设置问题。他认为“我国现有的综合性大学一般只有文科、理科两种学科，这是1952年确定的建制。但是三十年中的情况发生很大变化。由于科学的发展，牵涉到两种或两种以上学科的所谓‘边缘学科’越来越多……而我们综合性大学就基本上只有文理两科，对迅速发展科学事业很不利。在科学发展这种新情况下，国外大学的学科越来越多……所以今后似宜迅速创办多种学科的综合性和大学。作为试点，是否可以清华大学为基础来试办？”

这封信经过有关领导批示以后，由中宣部拟定公文，连同这封信转给了教育部。教育部又转给蒋南翔阅，并征求清华大学党委的意见，这在清华大学引起了不同一般的反响。有几位老教授不赞成，有的明确表示这是向老清华“倒退”。当时校长刘达对办文科有兴趣，最后意见大体统一后起草了给教育部党组的报告：“赞成清华向综合化方向发展，并以先建经济管理系和在马列教研室的基础上组建社会科学系，在宣传部领导下成立文史教研



1979年建五同学在母校聚会，前排左3为蒋钟埭、右1为作者马国馨

室”。所以如今人们评价蒋先生是“清华复建文科的首创者，他实实在在地催生了清华的文科”。

1982年11月17日，是蒋先生的80大寿，直到11月16日蒋钟埏才拖着病体到上海为父亲祝寿。正好这时蒋先生因口腔发炎也在生病住院，蒋钟埏就陪在父亲身旁护理。年底临走前她还说要回到上海来过春节，可是回到北京以后就病倒了。

蒋先生让小女儿和他的外甥，利用去北京出差的机会对蒋钟埏的情况做进一步了解。同时让小女儿把孙女海春带到上海来借读，以减轻大女儿的负担。小女儿回上海时把海春带来了，但对姐姐的病情只是简单说她因为练气功导致手肿，血小板减少。后来蒋先生外甥从北京回沈阳以后犹豫再三，还是给蒋先生写了一封信，报告了看望大表妹的真实情况。说她在北大医院住院，患红斑狼疮，面部、身上都已浮肿，眼睛已经肿得睁不开，经常昏迷不醒，说话很困难，病情十分严重。蒋先生看信以后大惊，涕泪俱下，泣不成声，立刻又给女儿写信：“你的病情，钟埏一直瞒着我，我还以为你仅是手肿，仍在上班呢。因而我也没有询问海春，现在我才完全清楚了。你的身体居然坏到如此？”此后上海不断地给蒋钟埏寄钱带物，希望她能够加强营养，盼望她能以精神的力量战胜病魔。

到了10月份蒋钟埏也出院了，但行走困难，也没法和出差到京的妹妹一起回上海。蒋先生得知有老中医专门可治此病，又去信：“希望你于春暖后来沪治疗，但望你在这段时间内好好保养

身体，无再生别的病，至为切盼。”但女儿回信只说暑假时可同儿子一起回上海，蒋先生急着又去信：“你的病既然找到有专长的医生能治，万万不要失此良机。”蒋先生为了女儿的治病，一而再、再而三地写信加以催促。女儿说很想念在上海的海春，蒋先生也设法托人在1984年初带回北京。但就在3月13日晚，家中收到吕开盛的紧急来电：蒋钟埏病危。妹妹和母亲商议后，决定瞒着老父亲，让钟埏以出差的名义一人赴京处理。

建五班的同学此前对蒋钟埏的病情全无了解，因为她从没有给大家透露过。我查了一下自己的工作日记，只是在当年3月15日写着：“下午接到四机部十院的电话，说蒋钟埏病危，于是马上通知了同学们前去探望，第一批去的有北京院的叶如棠、马丽和我，此外还有索奎琰、尹婉秀、叶筠、吕弘毅等同学。”3月17日的工作日记上记着：“问四机部十院蒋钟埏的情况，回答说好转，有排尿。”19日的日记是：“蒋钟埏情况继续好转”。之后我去香山开会，23日中午忽然接马丽电话，说蒋可能不行了。下午马丽和我赶到北大医院，蒋钟埏那时已是弥留，人一直处于昏迷，嘴里不断流出鲜血，最后于3点35分去世，年仅42岁。她是我们班工作以后最早去世的同学。

3月31日上午，在八宝山举行了蒋钟埏的告别会，十院对她在19年的工作介绍中说，她先后参加了4400、774、长沙电校、北大二分校等20多个工程的设计，圆满完成了任务。那天十院提供了交通工具，我们班在北京的有31位同学前往，原班主任崔克摄先生也参加了。告别会后，在现场我们和蒋钟埏的爱人吕开盛及海川、海春



1984年3月31日，蒋钟堦告别会后同窗、亲友的合影

两个孩子，还有她妹妹蒋钟垣一起照了合影。同学们久未相聚，但都没想到是会在这样的场合再次见面，现在想这已经是41年前的事情了。

处理完丧事以后，蒋钟垣急急忙忙就赶回了上海，她先是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和母亲私下商量，然后又慢慢向父亲透露，希望父亲能够承受这个打击。这对蒋先生来说是致命的打击，白发人送黑发人，尤其是自己特别钟爱和寄予厚望的大女儿。蒋先生一直认为女儿是因为产后出血后的输血引起的白血病而去世。实际上在蒋去世以后，我从有关的病案记录中，看来还是因红斑狼疮引起的全身器官的衰竭所致。此后在蒋先生给若干朋友的信中，都可以看出他的心情，满纸充满了悲痛：“爱女夭折，能无悲痛，即欲忘之，固未能也。”“我老年遭此不幸，为之万念俱灰。”同时想起在自己长期的学术研究中，大女儿对自己帮助最大，长年帮助自己抄写、复写稿子，在她病中也还是如此。我们也记得，在建五三班的女同学中多人的硬笔书法都很好，蒋钟堦就是其中之一。因为她从小就喜欢书法，蒋先生还手把手教她写字。

蒋先生在陈寅恪文集出版以后，继续他的研究工作。他编写完成《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1985年《论学杂著》一书由中州出版社出版，修改《楚辞章句校释》，继续整理陈先生的手稿，还在《师门往事杂录》一书中总结出：“综观先生治学之特色约有四端，一曰以

淑世为怀，二曰探索自由之义谛，三曰珍惜传统历史文化，四曰‘续命河汾’之向往。”此后多次整理、传承陈先生读书治学方法，校改陈先生的文集。但是他也时时都在想着大女儿临终时“要葬在父母的墓旁”的请求，同时也要考虑自己身后的长眠之处。于是和小女儿一起，选定了苏州吴县凤凰山的墓地，定有三个墓穴。1987年，蒋钟堦的骨灰由妹妹带回上海，3月8日由母亲和妹妹送往苏州下葬。此后，蒋先生由于心脏不适，他的活动很受限制，但对在北京读书的孙辈仍时时去信关心指导。最后蒋先生在1988年3月25日因脑溢血去世，这是在蒋钟堦去世四年后的三月。

此后，小女儿蒋钟垣定居澳大利亚。1992年，刘青莲女士也去澳大利亚和小女儿一起生活，最后在2002年病逝于悉尼，同年与蒋先生合葬于苏州凤凰山。吕开盛因长期患肾病，已于新冠疫情前去世。蒋钟堦的二子也都成人，子海川考入重庆建筑大学燃气专业，后到北京某设计院工作；女海春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现在北京某出版社任编辑。

2025年2月4日于北京